



中国的世界精神

ZHONGGUO DESHIJIJINASHEN

一、国际政治中的人类共同价值

当前思想家的任务^{*}

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决不会希望核子大战。只要是常识丰富的人，决不会相信靠两方面的核子武器竞赛而可以阻止核子大战。

—

在杜勒斯 的时代，美国不断地运用战争边缘政策。但经杜勒斯偶尔说破 便一时舆论哗然 群起反对 因为那是在玩火 而玩火终会是自焚的。杜勒斯死后，太空竞赛的优势转到苏联手上，举世惶惶又来应付苏联的战争边缘政策了。从战争的边缘走进战争的中心，只是手脚稍稍滑进一步的事情。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便掌握在这手脚稍稍滑进一步之间。

在上述情势之下，举世的政治家忙于拟策略，举世的军事家忙于作计划，举世的科学家忙于造武器。假定在三者之外，还有所谓思想家，亦即广义的哲学家，到底有没有一份任务可以分担呢？说到这里，大家便可以想到英哲罗素所领导的请愿。假定思想家的任务便是请愿，思想家便未免太可怜了。同时，从报上来看，罗素积极性的意见，似乎是要英国完全放弃核子军备，美国则在与苏联未达成裁军协议以前，依然会保持核子军备。其用意揭穿了说，是希望平时英国倚赖美国的核子力量以保持自己的利益，万一打了起来，则让保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美、苏互相毁灭 而英国则藏在夹缝中间 幸免池鱼之祸。假定思想家的用心便是如此，这未免太阴狠自私了。除罗素所表现的以外，思想家在目前局势之下，便毫无其他可尽的任务吗？

^{*} 选自《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三册“国际政治卷上”。

杜勒斯（1888—1959），“冷战”时期的美国强硬派政治家。1953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二

当代科学史的权威萨顿在其大著《古代中世科学文化史》的序章中指出：希腊文明的失败，不是缺少了知性，而系缺少了人格、道德。欧洲中世纪的停滞不前，是只强调了神的仁爱，而缺少了对现世的知识的活动。因此，他的结论是“没有仁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仁爱 是同样无价值 是同样危险的”。

若把萨顿的话，应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缺陷是强调了仁爱而忽视了（不是反对）知识。近二百年来，却连传统中的仁爱精神也失掉了。西方文化，则成就了知识，而忽视了仁爱。因为西方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文化，所以整个世界的文化危机，便暴露在有知识而无仁爱之上。

知识成就科学，科学的自身是没有态度的。科学对人类的造福或贻祸，不是决定于科学，而是决定于人们所给予科学发展、运用的方向。今日科学成果的核子武器，据说可以在三十分钟内毁灭人类，实际则是当前人类的意志要在三十分钟内毁灭自己。此之谓“自作孽，不可活”。如何从自作孽的人类中拯救起人类，使科学的方向，不向杀人方面发展，而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这才是当前思想家的真正任务。而此任务的实行，是要在西方文化中，建立仁爱精神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三

西方了解道德的价值，而体认得最深切的，无过于康德。但康德虽强调动机中“善意”的重要性，但他还没有扣紧仁爱方面来作为道德的内容。“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无间于古今中外，而可当下加以证验的。但康德必须用二律背反的方法，费这大的思辨力量，以证明道德理性的存在。这是说明西方文化的习性，不把人当下可以证验的道德事实加以承认而肯定其价值；却必须通过理智思辨的形式，以建立与事实有距离的概念，在概念上去辩论有无是非。于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不能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其应有之价值地位，而退居于无足轻重之列，致使人性中最宝贵的这一部分，被抑压泯没，不复在人生社会中发生应有的作用。

当代的思想家们，对人生问题，我希望不必再玩弄什么概念的把戏，而只

抓住人心当下一念所自然呈显出来的不忍人之心，亦即是仁爱之心，确定其为人生根本价值之所在，并承认这是一切价值之价值。顺着此仁爱之心的自身所具有的无限延展性加以扩充而不加以阻塞，则在每一个人的精神里面都涵融着整个的人类，而与之休戚相关，科学便自然会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而不会向杀人方面发展了。

但面对两大阵营的生死斗争，而欲在精神中求解决之道，是否有点像执《孝经》以御黄巾，过于迂阔可笑呢？诚然，仁爱并不能发生谈判的效果。但西方世界之内，存在有多少为仁爱之心所不容的问题？思想家们，应当先提倡以仁爱精神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化不平等为平等，化对立为融和，则西方世界的本身，将由此道德力量而加强了现实的力量。铁幕内部依然是人，依然有不忍人之心。铁幕外的不忍人之心，汇成洪流，以与铁幕内部的不忍人之心相呼应，则核子威吓的形势，或可慢慢软化下来，为人类另开辟一崭新的局面。最低限度，比静坐请愿，总会更有意义。

本文曾收入《记所思》 惜有删节

现据《华侨日报》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

上帝、良心南越*

各种宗教所信仰的最高神，我在这里概称之为上帝。中国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所信仰的是各人自己的良心。上帝与良心，到底是在怎样的关系之下呢？这是值得深思熟考的问题。

为解答上述的问题，首先要澄清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认为孔子是“畏天命”以后的儒家也未尝不重视“天”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宗教性的上帝信仰。这种说法，有的是来自儒教复兴的学者；更多的是来自老年改信宗教的知识分子。但我不惮指出自孔子起，“天”在一个纯中国人精神中的地位，极其至也只是一“虚神”的地位。所谓“虚神”有似于政治中的“虚君”制。英国的王室，日本战后的天皇正是“虚君”制的实例。孔子是“知天命”；“畏天命”但他从未想在“天”的自身上去下一番工夫，连对于宗教中起码地祷祝工作，也说“丘之祷久矣”而加以拒绝。天在孔子，正如英国日本的“王”和“天皇”，只是象征性的存在；实际负政治责任的乃是内阁。中国除了董仲舒对“天人”关系，做过一番比较具体的构造工作以外，其余所说的“天”不论其偏向“神”或“理”的哪一方面，都只有象征的意味，实际担当人生的指导、归宿之责的，只是良心。因为中国文化，一切是在良心上落实，天也始终不能不保持其“虚神”乃至“虚理”的地位，既不能进一步成为宗教的上帝，也不能成为西方式的形而上学。“良心”才是中国文化的命脉，才是有自觉的中国人的信仰。

* 选自《徐复观杂文——看世局》。关于此文的写作，可参见下一篇文章的篇首语。

二

我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是可以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但为截断众流，不妨先冷静地观察一件具体的事实，即是由南越虐待佛教徒所引起的一连贯串的事实。

南越对佛教徒的虐待，出于政治的意味甚少；因为正如吴廷琰 所说，他当选总统，以佛教徒所投的票为最多。只要回想到中世纪天主教对付异教徒的情形，则得到了政权的吴氏家族，只信任自己所信的天主教，因而想把佛教用暴力加以摧毁，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首先发出强烈抗议之声，因而辞职的顺化大学校长，是天主教徒。以辞职作抗议的几十位教授，中间也有许多天主教徒。吴氏家族中的一位大主教到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取消了对他的接见。是天主教徒的美国总统甘迺迪^②对南越压迫佛教徒和青年学生的政府，也采取了坚定的批判立场。在我写到这里时，从本日（十一月二日）的报纸上知道了南越武装政变的消息。参加的武装部队，正是以前帮助吴廷琰镇压过政变而获得吴氏非常信任的部队。其将校中，一定也会有天主教徒。在同一上帝信仰之下，对宗教自身的问题，表现出两种绝不不同的态度。而我们这种既非佛教徒也非天主教徒的人们，为了受迫害的佛教徒及学生而愤慨，同时也为了许多明智的天主教徒而得到安慰。南越的僧徒，对于罗马教廷的态度，也表示由衷地感激。这一切，只说明一件事：人类的良心，超过了各人信仰的限制，在某种太伤天害理的事项之前，自然而然地汇合在一起。

再看美国的黑人问题吧。歧视黑人的白人，多半与黑人信仰同一的上帝。而加入人权大游行中的白人，也显明地与黑人属于不同的颜色。由此可以了解，当人类良心呈现时，会超越人与人间一切的差别，也可以超越各人平日的信仰。

人只有在良心上超越了他的信仰时，才可以证明他所信仰的是上帝。良心的隐退，即是上帝的隐退；于是而始有各种不同信仰间的斗争、排斥。斗争

^① 吴廷琰亦作吴庭艳（1901—1963），1955年起任南越总统，至1963年在美国支持下的西贡军事政变中被杀。

^② 甘迺迪一译肯尼迪（1917—1963），1961年起任美国总统，1963年在任上被暗杀。

排斥的口号是上帝，实际则只是人类最丑恶地现实权势。吴氏家族们，是得到了良心的惩罚，也即是得到了上帝的惩罚。上帝与良心，毕竟是一体的。

三

因为南越的政变，转移了我写此短文的情绪，只好把上面的论题暂时打断，转而对政变的本身讲几句话：第一，我觉得越南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民族。从五月顺化压迫佛教徒以来，除了继续出现以死殉道的僧人之外，还有落发以去的外长，摒绝父女之情的大使，更有不甘受暴力诬控而自杀的作家，及千千万万的甘入狱而不辞的青年男女。这都说明最大多数的越南人，表现出了由良心所凝结而成的“志节”。在权力之前能表现出志节的民族，才是保有真正活力的民族。孟子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越南民族是有所不为的民族所以也是能有所为的民族。第二 我们的良心 要求我们反对吴氏家族。但我们的良心 也同时要求我们不要作“血的报复”。因此 吴廷琰个人的横尸车内 毕竟是莫大的遗憾。佛教最反对“冤冤相报”；我恳切希望政变成功的人物，能领取此一教义。而南越的佛教徒们，只可认此次政变，乃是人类良心对暴政的胜利。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胜利可言的。最后尤其寄望于南越的政变军人，军事政变乃是逼出来的不得已的下策。此一下策的自身，常即含有很大的反作用。所以只有诚心诚意地，为国家建立起今后可以不用政变作手段而即可让人民改变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才对越南有真正的贡献。除了这条路以外的任何英雄式的表演，决不能逃脱吴氏家族的命运。

载《华侨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

良心政治, 东方人^{*}

民主评论社的编者来信, 要我对南越的政变, 写一篇原则性的文章。在南越政变以前, 我曾写过三篇短文, 两篇发表出来了, 一篇没有发表出来。三篇短文的内容, 只在简单指出南越吴氏家族, 违反了人类的良心, 所以他们所走的是一条死路。非常不幸的是: 过去当许多人歌颂李承晚 是一位东方的伟大英雄人物时 我内心感到难过 便在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李承晚’的文章 指明他正把韩国和他自己 带向悲剧之路。过了两年 李承晚倒下来了 我又为那位本来是爱国的, 但晚年却被权力堕落下去了的老人, 感到深深地惋惜。尤其是对于他以后请求有一个“狐死正丘首”的机会而未得允许时, 更引起我复杂地感慨。自今年五月间南越顺化压迫佛教徒的事件开始后, 也居然有人为吴氏家族此种行为作不断地帮腔, 我更对这种黑了良心的观点而感到非常奇异, 所以便奋起写了三篇短文, 还引出了唐君毅先生的一篇文章, 对此种情形 做良心的声讨。结果“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吴氏家族 在人类良心之前, 倒得更快更惨。但对于吴廷琰之惨死, 却也同样引起我复杂地感慨。更使我感慨的是: 环绕着我周围的一条鸿沟, 一天更一天地深刻, 几乎深刻到我所有的前辈、同辈和后辈中间去。这条鸿沟随处随事,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假使用最现实的事例来说 我不了解我对于与自己有关的空间、时间、人物 何以从内心深处, 常于不知不觉之中发出“大家千万不可走吴氏家族之路”的沉郁呼声。而我以外的前辈、同辈, 尤其是后辈, 我更不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趾高气扬、手舞足蹈地 认定吴氏家族 乃是东方人的阳关大路。这些先生们 在生活

^{*} 选自《徐复观杂文——看世局》。原文共五节, 其中一、二两节已删去。

李承晚 (1875—1965), 韩国总统 (1948—1961)。执政后期因推行政治独裁 导致 1961 年的韩国军事政变而被迫下台 流亡美国。后客死异邦 生前终未实现‘狐死正丘首’的愿望。

上一切主张西化、现代化 只有在政治上 却坚决反对西化 现代化。编者先生要我对南越政变再讲几句话，到底我以什么人为对象而讲话呢？我在本月二日早上 拿起笔来写由南越问题所引起的‘上帝、良心’问题的文章 写到中途，台北的报纸到了 报道南越已发生了政变 于是我在‘上帝、良心’的标题下面，又加上‘南越’两字 在本月十日的华侨日报上刊出。这篇杂感式的文字 算是“上帝、良心、南越”一文的续篇吧！

十一月十二日志于东海大学寓次

良心与政治

吴氏家族，由今年五月以来压迫佛教徒所暴露出来的倒行逆施，当然和他所信仰的天主教不无关系。旧约中严峻暴烈的气氛，及两次对异教徒所作的血的清洗，这都是中世纪对付异教徒的根据。而由台湾今日某天主教刊物中流露出的攻击佛教的气焰，及某大主教因吴氏家族而大骂美国人的情形，也不难窥见假使他们得到了政权，很难保证它不出现南越的情势。不妨这样假定，时至今日，天主教经典中的旧约加上殖民意识及政治欲望，最容易出现我前面所说的宗教中的第三种情势。但正如我在“上帝、良心、南越”一文中所指出，反对压迫佛教徒而辞去顺化大学校长的是天主教徒；坚决反对吴氏家族此种行为的甘迺迪总统，也是天主教徒。罗马教宗之不接见吴廷俶大主教，并曾劝他们应采用较宽大的态度，这已与中世纪教廷的情形，大相悬隔。则我们不应因若干特殊情形而可抹煞天主教的伟大意义；因之，也不能说有权势的天主教徒，便一定会发生吴氏家族一样的行为。下面我想从另一方面，即是从政治方面，对吴氏家族惨局的形成，略加分析，也许更切实际。

在落后而混乱的南越 能打开一个局面 统一半部河山(此处有删节)我和许多人一样，承认吴廷琰是越南的一个有智能的人物。许多人说他是富于正义感的人，我因为对他不十分了解，姑且也加以承认。但他把权力集中在家族手中，纵容他家族集团的残暴贪污；并彻底压迫(此处有删节)有异见的人士，这是铁的事实。因压迫佛教徒已引起内外广大的反感，却依然纵容他的弟媳陈丽春 不断发出残酷尖锐的怪论，一点也不了解‘妇有长舌 为厉之阶’的教训；并对人神共弃的吴廷柔，拒绝一切劝告，使其怙恶不悛；这也是铁的事实。这种铁的事实，是表现了他的智能？还是表现了他的正义？为什么本来

有才智，本来有正义感的人，却变成这样的昏庸、堕落？我根据中国文化的良心之教，可以先总结一句：凡是认为天下是由个人才智所打出来的，因而把天下视为私人产业的人，在今日，必然会走上吴廷琰的始智终愚之路，也必然会得到吴廷琰的结果。

从我国历史看，刘邦正是最先由平民而打出天下，并把天下当作私人产业的人物。但他一直到死时，还保持住他的智慧；所以虽经吕氏之乱，依然延长了二百一十多年的基业。此后，凡是开创之主及身而亡国的，究竟占极少数。何以进入到现代，凡是家天下的人，不论他开始时是如何英武，但结果几无不由英武而愚昧，无不及身而亡，这又是什么道理？说破了倒也很简单。中国历史上承认家天下的专制是合理的，所以家天下的人，可以得到多数人的承认；而他自己也比较能心安理得；因此，他信任的圈子可以扩大。现代家天下的人，内心也知道这不能得到他人真正地承认，于是经常存有防闲猜忌之心，信任的圈子，不能不越来越狭小，最后只好集中于他自己家族之上，再配上一套跑龙套的班底。一个人的智慧的高下及其措施的得失，与他所信任的圈子的大小，有绝对不可分的关系。信任的圈子愈小，则感到敌人愈多。感到敌人愈多，则猜嫌愈甚，手段愈辣。并且反转来，猜嫌愈甚，手段愈辣，逼使他的信任圈子愈小。二者乃是互相激荡的东西。最后，只有把自己的运命，安放在自己家族之上。家族对于国人而言，那是太脆弱了。

上面的分析，是没有把此种人的“正义”的因素计算在内。假定吴廷琰本是有正义感的人，一开始并无家天下之念；但他因不明了人民的性格，因而不明了民主政治的意义及效用，他的结果，也与上面所说的还是一般无二。“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神”这只有大智慧、大德量的人才可以了解。一般所谓才智之士，总是凭藉自己的权势，以与他人絮长较短，而常觉得自己的才智，是高出于任何人的才智之上，于是只要求人听他的话，而他决不听任何人的话。这便形成拒言逆谏，文过饰非的性格。拒言逆谏，文过饰非，本是一件事的两面。在另一方面，凡是只知道听话的人，一定是无骨气、无能力、无责任心、不敢用头脑，只知做姿态的人；这种人当然不会做好一件事。而为了固宠希荣，便只好逢迎说谎。由上面牵下来“饰非”的线索，组成由上到下的一条作伪系统。由下面报上去的说谎的线索，组成由下到上的一条作伪系统。由两条作伪系统所构成的政权，除了“搭伙求财”以外，连鸡鸣狗盗这一类的考验也受不起。这在太平时代，也会像汉代的桓灵，明代的万历一样，一天腐乱一

天的(此处有删节)同时,在上下作伪的环境之下,万一有做实事、说真话的人,便变成为可疑之人。有位朋友曾经谈笑地说:“某人有问题,大概是因某人讲了真话”。如果社会上发出了良心的批评,更容易引起猜忌,便常采用制造敌人的方法去消灭敌人。心理上的敌人愈多,信任的圈子便愈小。即使是正义的吴廷琰,最后也只有走上家族政权之路。良心呈现的本身,不能用进步的观念加以规定。但因教育、知识、交通的各种进步,引发良心呈现的机缘,一天广大一天,于是良心呈现的人数,也会一天进步一天的。良心的本身,不仅通万人而相感;并且也极有客观的合理性。所以今日的家族政权,一定为南越人民的民心所不许。同时也为天下人的良心所不许。大家如看了反派得势的电影,尚会感到愤愤不平。这种良心所不许的处所,一定要由良心之力加以摧毁。又有什么疑问?中国的谚语说:“莫道皇天无报应,只分来早与来迟。”早与迟的问题,是历史中的时间问题,所以以良心为主的中国文化,“特重视”历史的教训”。把问题摆在时间的平面上看,良心似乎无凭而更无力。但把问题拉长在历史之流中去看,则良心是可凭而又是有力的。此即中国人的历史观与人生观的合一点。吴氏家族的惨局,正是良心之力所昭示的历史的教训。

中国治道之穷 及良心在政治呈现中的新形态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简略地说,向两个大方向发展。一是向民主政治方面的探索,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王念孙谓当作举者是“能”,这类的思想便是。但这一方向,因受历史条件及地理环境的限制,没有发展下去。另一方面是发展向儒道两家所强调的君道臣道。荀子即专有君道篇、臣道篇;而臣道之能否实现,实以君道能否实现为其前提。儒道两家所强调的君道,实际是把在民主政治下作为一个政治领导者所应遵守的原则,要求由君主制度下的君主,将其表现出来。我也常常想,假定东方地区在民主制度未能完全建立起来以前,像李承晚、吴廷琰之徒,能按照中国圣贤所提出的君道去领导其政治,东方也必可形成小康之局,渡过目前过渡时期的难关。但因为下述两种原因,这依然是不可能的。第一,要实现君道,必以圣人之德为其前提条件。就道理上讲,固然人人可以为圣人;但要使手握权力的人作圣人,如牵骆驼通过针孔一样。因此,儒道两家所建立的君道,在历史中大部分是落空的。第二,政治领导者的道德,必以“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为其根源。“不与”是不视为己有,因而与自己私人不相关与之意。人君能把政权及由政权所获得的精神与物质上

的势力，不当作是自己私人的东西，才能引发出作为一个领导者所须具备的一系列的道德原则。换言之，必须有以“天下为公”的民主精神，始能实行君主制度中的君道之实；这对于一个打天下出身的英雄好汉而言，怎么是可能的呢？纵使有这样的大仁大智的“有天下而不与焉”的领导圣人出现，谁又能担保当圣人“不与焉”的时候，其他的野心家不会乘机来“与焉”？则结果圣人的大公，实所以成就野心家的野心，则圣人依然是白费。儒道两家，想出了如何领导政治的有系统而且有永久价值的“君道”，又想出了政权改变时的禅让形式，但毕竟没有在客观制度上建立起凡参与政权的人，即使都不是圣贤，而也必须作和平改变政权之实，则君道便只有落空，禅让也徒供假价。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政道之穷。凡是要把政权固定为一身一家一集团的千秋之业的想法，结果必走上李承晚吴廷琰之路。而这一罪恶且悲惨的局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追索到底，竟找不出答案。这是东方人的良心呈现所受的最大的限制。惟一的活路，只有接上由西方近代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一旦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便把良心上的一大梦魇唤醒了过来，而使良心与反良心的斗争，成为争民主与反民主的坚定形式。我们可以说，民主政治，是人类良心在政治中所呈现出的新的形态。

东方人在政治上无特殊的思维模式

台湾对南越政变，在舆论上有了强烈反映。把若干舆论稍加整理，大概包含下列各点：一、吴廷琰是非常伟大的政治人物。二、民主政治，不合于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三、由东方的思维模式所建立起的政治形式，正是吴廷琰的家族政权的形式。四、南越事变，是出自美国的“民主输出”。五、今后东方人政权的基础，必须建立在由东方的思维模式所思维出的家族政权基础之上，美国万不可再想输出民主，加以破坏。当然，除出上述之外，也有不同角度的舆论。

我发现上面的说法，几乎全是南越长舌妇陈丽春的应声虫。真想不到这位美丽的长舌妇，也和凌波一样，疯魔了台北的人心，致使台北出现有这种“妾妇之言”的舆论。若认为东方人对政治问题，有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必然是东方人和西方人有不同的人性。这不仅永远断绝了东方人进入民主政治之路，并且也为十九世纪许多西方殖民主义者斥有色人种为天生劣种的谬说作了证明。若我们对民主的要求，是由于美国的民主输出，则我国戊戌政变

诸君子，一直到孙中山先生，许多先烈先贤为民主所作的努力，岂非都是买办阶级所作的努力？这种妾妇之言，实在辱没了我们东方人，辱没了我们的国格，辱没了中山先生及其伟大的遗教（此处有删节）。我想不到近年来，有些人政治意识的堕落，一至如此。

美国在东方国家中，有许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这决不在于他的“民主输出”。自来的殖民主义者，不仅不作“民主输出”，并且最怕殖民地中的民主运动。这是由二百年来西方殖民的历史所证明的。美国只有在对东方人诚心诚意地推扩民主政治的影响时，始能确切证明它之所作所为，决不同于殖民主义。在我的了解，美国乃是由它的“开明的利益”来支持它在东方的行动；只有在它感到东方的落后的家族政治，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它的“开明的利益”时，它才会想到民主政治。美国对东方有超过军援经援以上多少倍的努力，这即是它无孔不入的传教活动。就我观察所及，凡是通过美国的传教而信仰宗教的人，多发生民族意识消退，更不关心政治民主这一类问题的影响。同时，为美国所捧的东方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女生外向”，决不真正关心祖国民主问题的知识分子。这才真是值得东方人细加玩味的问题。民主政治，是“人心之所同然”，是人类良心在政治方面自然的归宿，何待美国输出？又为什么怕美国输出？东方有些豪门系谱，在与他们私利有关时，则不惜卑躬屈膝地去向美国攀援，置人格国格于不顾。但在关系于共同的要求，共同的利益，而与某些人的特殊私利相冲突时，则抬出“民族主义”的帽子来加以抗抵。实则像吴氏家族口里所说的民族，只是他们与民族相敌对的家族罢了。（此处有删节）

南越的政变，当然是非常的不幸。因为由此一方式来改变政权，其本身即含有许多危险性。但南越在被吴氏家族逼得无路可走之际，依然能打出一条不得已的路来，这和我国历史中被暴君逼得无路可走时，终会由陈胜吴广之徒起而加以打倒，因而得以延续民族的命脉，是同样的情景。中国过去，从来没有一种议论，不责嬴秦之暴，却责陈胜们无故挑起五年逐鹿之战的。我恳切希望大家以吴氏家族为戒，在各自良心照耀、汇合之下，大步走上真正民主之路，这才是根绝不幸的希望之所在。

一个中国人读尼克逊的就职演说

说老实话，我过去对尼克逊的印象并不深刻。但这次读他的就职演说，才知道他对问题能作深刻地思考，也能接受其他的人们所作的深刻的思考。尼克逊没有浪费他过去失意的八年岁月；他的人格与智慧，在失意的八年中，是由不断地生长而臻于成熟了。这正是美国目前遇到空前的困难而依然会克服前进的良好象征。

演说中，包含了美国今后在国际政治上所追求的目标与他们所要走的方向；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意见。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下面的这些话：

三十几年前，罗斯福站在同一地点，对我们遭受经济恐慌……发表演说，他能说“感谢上帝，这些困难，仅与物质的东西有关”。我们今天的危机是相反的。我们发现，我们有充分的物质，但在精神方面却是贫乏。能极精确地到达月球，但是在这地球上则是一片聒耳的争执。对一项精神的危机，我们需要一个精神的答案，寻找那个答案，我们仅需反求诸己。当我们倾听“我们天性中的善良天使”之际，会发现他们赞美一些简单的东西和基本的东西，诸如善良、得体、博爱、仁慈等。伟大是来自简单的事物。如果我们要克服使我们分裂的因素，并加强使我们团结的因素的话，则这些简单的东西，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不论我们进入到宇宙多远，我们的命运不在众星之中，而是在地球本身，在我们自己手中和我们

自己的心中。

二

没有人会怀疑科学、技术所能提供人类物质生活向上的伟大贡献；也没有人会怀疑物质生活向上，为人类所追求的正当目标。问题是出在二十世纪以来，出现了科学一元论的狂想曲。一方面认为只要从科学上得到知识、技术的进步，便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另一方面，认为凡是不能用科学实验、演算的方法加以处理的对象问题，便是不真实的对象，无意义的问题。由此推论下来，人类只有物质方面的生活，而没有精神方面的生活。美国今日的情势证明，其一部分人因物质生活上的缺乏，固然能引起严重地社会问题。但更多的严重地社会问题，乃起于各个人的念虑之间，与物质生活的缺乏与否，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这样便逼着尼克逊在其就职演说中，不能不作美国今日所遭遇到的精神危机的呼吁。尼克逊的呼吁，乃根据摆在美国每一个人面前的铁的事实；不需要什么科学实验室中的证明，已强有力地推翻了科学一元论的狂想。

在上述科学一元论的狂想之下 美国一方面繁衍了大量的“虚拟科学”有如逻辑实证论、行为主义；另一方面又繁殖了以潜意识为主导的各种反理性的艺术。两者共同的倾向是彻底反对人生价值，共同的归趋则是走向野蛮主义。更有的人以为科学技术是日新月异 人的生活方式 也要随之日新月异 所以对于一切寻常的 但为了维持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庸言”“庸行”皆加以唾弃，制造反感。殊不知人的生理构造未变，安放在生理构造里的良心未变；则顺着良心所发出的简单平易的良知良能，永远是人类向前生存，向上发展的基点。真正伟大的事功，都必须由此一基点伸展上去；否则小焉者将如美国今日的希癖 大焉者只能像希特勒。尼克逊“伟大来自简单”的呼吁 这是他和他的智囊团，经过穷幽极深的探索、体认以后所得出的结论。由对良心的辄蔽而来的人生的空虚、混乱 存在于贫窳之中 更存在于豪华放浪之后。科学、技术可以把我们摆脱地心吸力，送入进其他的星球世界；但不能摆脱由良心辄蔽而来的人生空虚与混乱。于是尼克逊在美国快实现登陆月球的时候，为人类还

是要回归向地球，还是要回归向人类自己的良心，作了有力的呼唤。

三

我读了尼克逊的上述讲辞，感到尼克逊站在总统就职的地方，仿佛是很恳切地在向我们讲“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是指点我们如何才算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这使我非常感动，也使我非常惭愧。我决不否认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为了争取生存，应当全力以赴。但我也永远不能了解中国由‘性善’所建立起来的一套中庸之道，为什么会妨碍到科学、技术的追求？为什么为了追求科学、技术，必须丢掉由良心所发出的简单平易的中庸之道？更不能了解炫耀一点美国的反理性、反常识的小玩意，有如破布艺术、意识流的小说、白日梦的诗之类，极其究也，归结到女人一丝不挂，便沾沾自喜地以为这便是进步、现代化。

美国花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费，也不算少；但就我的观察所及，发现他们的研究，有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是美国的汉学家，是把他们国家的富强，加到他们自己的学问里面去；所以当它们并看不懂中国古典时，便以为自己的学问大得无比。第二大特点是，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只在说明中国文化对现代人，对美国人是一无价值，中国在文化方面，今后只有等着美国的施舍。我相信我们的文化有缺憾，我相信这种缺憾需要大量吸收西方文化来加以弥补。这难说中国文化，对西方，对美国，便一无裨补吗？这说明绝大多数的美国汉学家的心灵，是由骄侈而处于闭锁的状态。他们写出一本一本的书，好像一位厨子做出的一碗一碗的菜，在碗上标明‘这菜是不卫生，不能吃’的情形一样，我觉得有点可笑。

载《华侨日报》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